

当代欧洲 社会理论

黄瑞祺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黄瑞祺 主编



社会理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欧洲社会理论 / 黄瑞祺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308-05930-5

I. 当… II. 黄… III. 社会学—理论研究—欧洲—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868 号

当代欧洲社会理论

黄瑞祺主编

策划编辑 钱济平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出品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

排版 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965mm 1/16

印张 25

字数 332 千字

版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5930-5

定价 42.00 元

主编序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清·赵翼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朱熹

社会学起源于动荡不安的 19 世纪欧洲，当时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反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交织成一幅混乱的社会景象，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们希望仿效自然科学建立新的、实证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寻找社会规律，以便拨乱反正、恢复秩序或建立理想社会。这段时期有孔德（1798—1857）、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马克思（1818—1883）以及斯宾塞（1820—1903）等的社会政治学说，影响比较大。这可称为欧洲社会理论的第一波。

1890—1920 年代是欧洲社会理论的一个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可视为欧洲社会理论的第二波。众所周知的一些古典社会理论家，如韦伯（1864—

1920)、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58—1917)、齐美尔 (G. Simmel, 1858—1918)、帕累托 (V. Pareto, 1848—1923)、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等都是在这—时期撰写或出版他们影响深远的著作。他们影响所及除了后世的欧洲社会思想之外, 尚且影响到美国社会理论。

美国社会学在理论上很多 (甚至大部分) 都是从欧洲输入, 在美国社会学早期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许多学者通常都会花一段时间到欧洲 (主要是德国) 进修或留学, 例如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 曾于 1888 年左右赴德国莱布尼兹及柏林进修哲学; 帕克 (Robert E. Park, 1864—1944) 也曾于 1899 年赴德国进修; 斯摩尔 (Albion W. Small, 1854—1926) 则主要是在德国接受教育。上述三位“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者都在柏林上过齐美尔的课, 深受其影响。帕森斯 (1902—1979) 曾到伦敦大学进修, 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以韦伯论资本主义为博士论文题目。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主要是阐述及整合几位欧洲思想家的学说, 对于美国社会学界继受欧洲社会思想传统贡献卓著。默顿虽然没有到过欧洲留学, 对欧洲社会理论却具有渊博的知识, 受韦伯、涂尔干以及齐美尔影响颇大。还有些美国社会学者系欧洲移民, 出生于欧洲, 扎根于欧洲文化, 例如索罗金 (P. Sorokin, 1889—1968) 和舒茨 (A. Schütz, 1899—1959) 后半生在美国发展他们的学说, 影响美国社会学颇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视为欧洲社会理论的第三波。闻名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包括霍克海默 (1895—1973)、马尔库塞 (1898—1979)、阿多诺 (1903—1969) 皆属之。霍克海默等人 20 世纪 20 年代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创立了社会研究所, 二战前流亡美国, 战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回到德国, 对德国和美国学术界都有比较大的影响。马尔库塞则留在美国, 对 1968 年的学运影响颇大, 他的《单向度的人》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理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卢卡奇 (G. Lukács, 1885—1971) 也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理论家, 影响欧美社会理论颇大。

二战后是第四波欧洲社会理论的兴盛期，德国方面有：哈贝马斯（1929—）、卢曼（1927—1998）；法国方面有：阿隆（R. Aron, 1905—1983）、福柯（1926—1984）、布尔迪厄（1930—2002）、利奥塔（1924—1998）、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 1929—2007）；英国方面有：鲍曼（Z. Bauman, 1925—）、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29—），可谓人才鼎盛。这些二战后的欧洲社会理论家除了继受前辈欧洲社会理论家的遗产之外，也深受美国社会理论的影响，例如卢曼、哈贝马斯及吉登斯等皆深受帕森斯的影响。这里见证了美国社会理论对欧洲社会理论的回馈。而第四波的欧洲社会理论家更是对美国社会理论（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巨大，哈贝马斯和福柯就是显著的例子。

上述的分期提供理解欧洲社会理论的一个架构，同时提供本书一个背景，而上述的人名则是提供一些具体例证，不过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在书中不一定都有所论列。本书所论列者皆为晚近的社会理论，且与当代生活比较有关联的。

再者，本书论列的吉登斯（1938—）（英国）及奥菲（Claus Offe, 1940—）（德国）在年代上略晚于上述第四波诸人，属当代社会理论家。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美国）和奥尔森（Mancur L. Olson, 1932—1998）（美国）则比较偏向经济哲学或制度经济学，不过其理论却与当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二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理论论述”包括了对欧洲社会理论的一些专题的探究，这些专题包括卢曼的系统理论、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吉登斯的第三条路、阿多诺的教育和音乐理论、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和艺术理论、消费文化社会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桑巴特论资本主义以及理性选择的马克

思主义等等。这些专题跨越了且贯穿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福利、美学等知识领域，显示重要的理论是不能墨守学科界线的，同时显示社会理论是多学科的、综合性的。

下编“直面大师”则包括三篇综述哈贝马斯、卢曼和吉登斯三位大师的人品和学问的文章，作者皆曾亲炙过三位理论家，闻其警教，向其请益，故能对其进行亲切、具体的观察及描述。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虽然根据解释学作品有其自身的生命，不一定需要通过作者来理解作品。不过勿庸否认，作者为作品的源头，若能亲炙作者，其作品遂成为活水了，诚如朱熹说的“为有源头活水来”。

本书作者大多为台湾地区的学者专家，且多曾留学欧洲，希望能通过本书与大陆读者交流切磋。本书编辑过程承蒙助理张文绮小姐和访问学者黄瑞祥先生的协助，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钱济平小姐费心的筹划及联系，并此致谢。

黄瑞祺

2008/2/12

谨志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欧美所

目 录

主编序

上编 理论论述

- 社会学如何启蒙 顾忠华 汤志杰 3
——评介卢曼的理论发展
- 社会不平等及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个体主义 鲁贵显 21
——系统理论对“结构/个体”的超越
- 论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 李俊增 42
- 吉登斯论新右派重构传统家庭伦理 郭俊严 80
- 阿多诺的半教育理论 黄圣哲 111
- 听的离散 黄圣哲 131
——阿多诺论流行音乐
- 论布尔迪厄社会理论的象征性和反思性 高宣扬 141
- 布尔迪厄的艺术之眼 许嘉猷 176
——观赏者之凝视与区分
- 当代消费文化理论的分析架构 刘维公 207
——文化经济学、生活风格与生活美学
- 欧美福利国家的内在危机 郭俊严 227
——奥菲与哈耶克的视角

- 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式国家 吕建德 262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危机
桑巴特论奢华与资本主义 张维安 311
理性选择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黄瑞祺 339
——试论从奥尔森到艾尔斯特的理论转折及其含义

下编 直面大师

- 会见哈贝马斯 黄瑞祺 363
——访问纪要
理论做为生命 汤志杰 371
——悼念德国社会学家卢曼
吉登斯现象 黄瑞祺 382



理论论述

社会学如何启蒙

——评介卢曼的理论发展^①

顾忠华^② 汤志杰^③

内容提要 面对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现代社会，我们观察社会的角度是否有必要改变呢？德国社会学理论家尼可拉斯·卢曼认为他继承结构功能论发展出的系统理论，代表了“社会学启蒙”的一个新境界。有别于古老欧洲传统标举的理性批判，卢曼以系统/环境的差异作为观察的起点，全方位地探索各个相对自主之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宗教等等——在履行其功能上的演化成果。透过系统理论的解释，卢曼企图呈现社会系统自我生产的机制，以及了解这机制对启蒙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经由自我描述获致的自我认识而言，系统理论的反省高度的确开启了另一扇的启蒙窗口。

前言

在西方朝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启蒙”代表着人类意识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启蒙运动”的意义不仅在汇集当时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力量，

① 本文第一、二、五、六节由顾忠华撰写，第三、四节由汤志杰撰写，顾忠华修订。作者在此感谢评论人卢政春教授及其他讨论者之宝贵意见。

② 顾忠华，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

③ 汤志杰，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使得社会的变革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它同时也宣告人类的“理性”乃普遍和自主地存在于每个个体里，只要个人勇于去运用理性，便可以脱离不成熟的蒙昧情境。一直到今天，“启蒙”和理性、科学、反省、批判等概念都维持着密切关联，而甚至所谓的“启蒙方案”（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仍被认为是可以照亮人类未来之路的理想方向，毕竟理性的潜能尚未充分发挥，人们面对众多“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危机现象时，或许不免缅怀起启蒙时代对理性之光的无比信心（Habermas, 1985）。

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Niklas Luhmann）在他 1967 年于明斯特（Muenster）大学的就职演说中，便以“社会学的启蒙”为题，探讨了社会学是以何种方式承担着启蒙的任务。他对这个问题的持久兴趣，也表现在他自 1970 年起，连续将理论性文章以《社会学的启蒙》作书名结集出版，至 1990 年已出到第五卷（Luhmann, 1970; 1975; 1981; 1987; 1990）。卢曼本人是在 1993 年于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退休，他的学术生涯完全贡献给社会学的理论创作，著有专书 30 余本，论文 300 多篇。他提出的“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独树一帜，这套理论具有何种特色？又为何宣称它有其他理论所不及的“启蒙”效果？它的“启蒙”意义奠基在那些预设上？我们如何来评价卢曼提供的“启蒙”策略和他的理论内容？本文尝试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理解“系统理论”，以掌握卢曼学说的核心思想，即使他的理论到今天尚未为英语世界普遍认识，更常被视作异端，但回顾 20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史，卢曼确能跻身于独创一支理论学派的大师间而毫不逊色。卢曼的理论不归路，就是肇始于他去敲开了另一扇的启蒙窗口！

一、系统理论的雏形

卢曼开始对社会学理论产生兴趣，源自于他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获得不少灵感。帕森斯的理论建构可说是尝试给予社会学一个不同于古典三

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观察框架，以便能发现现代社会在演化过程上的特殊成就，这包括人们的志愿性行动透过价值的概化，一一纳入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使得社会的运转有高度的协调性和均衡性，从而也对所谓的“霍布斯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提出理论层次的解答。

结构功能论曾经在社会科学界取得过近乎“显学”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却后继无人，抵挡不住新兴学派的批判而陷入低潮。卢曼在这时候承接帕森斯的志业，他认为结构功能论固然有其弱点，可是它仍有许多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尤其帕氏的基本论点常被忽略或受到误解，因此不该遽然停止这一理论方向的努力。卢曼本人上过帕森斯的课，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帕氏一再强调“行动即是系统”（Action is system）^④，这句格言随即成为卢曼理论探索的出发点，他站在帕森斯获致的洞见上继续向前，同时也不讳言自己的目标是要超越前人的理论成果，以大胆的创新来提升社会学理论穿透现象表面的解释能力（Sciulli, 1994: 38）。

为了达到理论创新的目标，卢曼的策略是不惜向其他学科借取相当多的概念，并且不限于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在初始阶段，卢曼首先是得确立“系统”概念的核心位置，他一方面引进现象学的方法，将“意义”和“行动”分解为导向“选择”的机制，再以系统的“功能”来整合无数个分散、独立但同步进行的个别选择；另一方面他还修正了早期的均衡观，赋予系统“自我指涉”的特质，以描绘系统在“时间”面向上动态的过程。卢曼对社会科学一向追求的“因果分析”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社会现象过于复杂，任何想穷尽“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关系的尝试注定失败，而唯有将“功能分析”推到极致，并采取“系

④ 此处根据的是卢曼讲授“系统理论导论”的课堂演讲录音，共14卷，由海德堡 Carl-Auer-Systeme 出版社于1992年公开发行。有关“行动即是系统”的看法，卢曼于介绍系统理论源起（第一卷）时，特别强调这是帕森斯独到的心得，意指唯有从系统的角度观察，才能充分解释“单位行动”的结构特性。卢曼受此启发，不再以行动为直接研究对象，而径自就系统的层次寻求解决帕森斯遗留的问题。除了帕森斯之外，卢曼的系统观当然还有诸多其他来源，请参阅 Luhmann (1984)。

统理论”的观察角度，才可能让我们理解整个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则。卢曼的这些基本构想，大致在他早期的相关著作中已充分开展（Luhmann, 1964; 1968; 1969; 1972; 1980; 1981a; 1982），迄至 70 年代初，他旗帜鲜明的“功能-系统理论”取向（以有别于“结构功能论”）成为德国社会学界的注意焦点之一，加上他和哈贝马斯的论战更助长了声势，“系统理论”和“沟通行动理论”间的“争霸战”堪称是二次大战之后，德国在思想学术方面的一件盛事（Habermas & Luhmann, 1971；顾忠华，1990；卢政春，1992）。

关于系统理论的雏形，回顾起来，卢曼仍相当倚重“自动操控学”（cybernetics）所提供的视野，系统和环境的区分比较机械化，也还需借用许多具体的经验事实（如组织和管理）来证明“系统”的存在，以及描述个别之社会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宗教等等）在自主逻辑下的运作程序。举例而言，他由自己从事过的行政事务工作和法律专业训练出发，对行政组织的功能性加以诊断，并发展出一套有关法律实证化、程序化以确保正当性的看法。这意味卢曼不排除系统理论在“实用”上有其帮助决策流程理性化的效果，但同时这亦容易落人把柄，导致系统理论一开始就被反对者批评为只是研究“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的技术性思考，或不自觉地沦为统治阶层的工具。经此教训，卢曼在往后的理论论述中，愈来愈脱离实用倾向，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也愈趋抽象，其著作的难读、难懂可称上一绝。不过，卢曼建构系统理论的背后，本来便隐含着不少“后设”层次的观点，他对“世界”（Welt）和“复杂性”（Komplexitaet）的界定，不是一般经验性说明，反倒有浓厚的哲学成分在内，这使得他的系统理论不致流于经验事实的堆积，而得以朝着更普遍和纯粹作为“知识批判”的方向挺进。在他出版《社会学的启蒙》第五卷时，他在前言中即以“知识批判”来诠释系统理论的整套计划（Luhmann, 1990: 7），我们下面还会回到“知识批判”与传统所谓的“理性启蒙”之间的分疏，以阐明卢曼对“启蒙”概念的理解，这之前仍须检视系统理论所含摄的“世界”观，方能掌握卢曼分析现象的立足基点。

二、系统理论的“世界”观

对卢曼来说，世界无非是无穷的复杂性，而这正是他理论的起点与根本预设。这样的起点与预设，正相应着他整个的理论设计：一套抽象到足以掌握“世界”的理论。他继承了韦伯行动论及帕森斯结构功能论对意义、系统的分析，却又另创新犹，在对偶连性（Kontingenz）加以重新分析、诠释的基础上，开展出他的世界观。他这种观点企图从日常生活中的当下来发掘“社会”的起源，换言之，在偶连性的观点下，社会如何可能（汤志杰，1994）？

在放弃了本质与表象这种区分后，卢曼认为，唯有借助于系统理论的观点，我们才能自圆其说；这意谓着我们的讨论本身也只是某一个观察系统的（自我）观察结果而已。在卢曼的理论中，处处都流露出这种现象学式回归自身的做法。比现象学更进一步的是，他甚至要把进行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家也拿掉，将主体概念这种古老欧洲思想的实体观给排除掉，而单纯地只剩下世界-系统与环境的统一性。因为不存在着超越尘世的主体-超验的自我，所以我们只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这时，世界概念正可作为我们的原点。依着生活世界的理论脉络，卢曼主要从意义/世界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世界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进入的，因而是去中心的。更重要的是，在偶连性的世界观下，意义只是“为可能性所环绕的现实性”（Luhmann, 1990a: 83），复杂性则指“总是存在着较所能实现更多的体验和行动的可能性”（Habermas & Luhmann, 1971: 32），因此世界正是这复杂性的整体，或者说所有可能的复杂性。从作为焦点的现实性向四方延伸，可以开展出无限的、潜在的可能性界域。当系统作为现实性，作为观察的焦点时，更复杂的环境正是其界域，而世界则是界域的界域、最终的界域、所有界域的重叠。任何想在思想上超越它的企图，实际上只是扩大了它而已；这些企图仍然需要世界概念，因为

它们仍必须关注那些不存在者。

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种世界概念，是为了达到彻底的一般化，它将所有的差异“加以漠视”（Indifferentisierung），甚至把对系统理论而言，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系统/环境差异也加以中立化，以把握系统/环境的统一性（Scholz, 1982: 87）。在认识到差异是一切区别、分化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可能性与复杂性的基础，同时又意识到我们的讨论只是系统自我观察的一环，而观察最终无非是一个区别的情况下，世界正是无差异的最终概念。如此，世界界域才能扬弃所有个别系统观点的差异。因为从个别系统的观点来看，每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系统/环境差异。唯有让世界作为所有系统/环境差异的统一性，才不会落入将部分实体化的谬误，自以为掌握到了绝对的真理，同时在退回到这个后设的观察层次时，却又不致丧失了对整体的理解。世界在这种自我指涉的循环性中被预设作为一种封闭性，卢曼以此来跳出目的论的难局，并用这种既包括又排斥的第三者逻辑来摆脱逻辑上的套套逻辑（tautology）与吊诡（Luhmann, 1984: 107, 283-285）。这种封闭的循环之所以有基础，在于世界无穷的复杂性正是我们基本的存在情境。“唯有从它（指世界）极端的复杂性的观点来看时，才值得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作为所有人类经验之普遍的界域这一问题。”（Luhmann, 1979: 5）正因为人类有限的讯息处理能力，世界的无限复杂性才成为一个根本的问题，而其在人文社会世界的主要展现，则是双重的偶连性（社会性起源）的问题。对卢曼而言，这是社会学分析必须反省到的问题起点。同时，这种世界观的优点是，以它高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可以贯穿宏观及微观的社会学研究，甚至可以整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架构（Luhmann, 1985: 5; 1983: 993-994; 1990a）。

在这种世界观下，虽然我们已经放弃了对社会有着一种本质性的理解，但却可以掌握到一个整体的观点。因为在世界作为无穷复杂性这个最终界域的背景下，社会这个系统的特殊性就突显出来了。对卢曼而言，社会是包含一切的系统，它的构成元素便是所有直接可触及的（zugaenglich）沟通，其独特的功能在于将最终及最基本的复杂性化约加